



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寨侗寨。

谭建华 摄

编者按:

作为《中外建筑》杂志社的原社长和专业摄影师,谭建华见过、拍过很多建筑,对建筑的流派和种种理论也再熟悉不过。临近退休时,他蓦然发现,自己心中最美的建筑,还是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小湘南村落。于是,他决定出发,行走湖南山水,寻访潇湘古村。

一走15年,他跑遍湖南省的80多个县、800多个古村落,拍摄照片近10万张。7月16日—9月16日,他的心血结晶——“潇湘古村入画来·湖南古村美展”,在长沙图书馆展出,两本《湘魂的摇篮》大型纪实画册同步推出。

展览和画册,生动再现了潇湘古村的自然风光、建筑特色、乡土民俗、历史人文。他说,这是一次对乡土的回望,也是一场对抗遗忘的竞赛。

谭建华

我的古村老屋情结

一

小时候最初的记忆是乡村老屋的记忆。出门是个小天井,过门槛是大厅屋、大天井。大厅屋分上、下厅,上厅有神龛,神龛上摆着菩萨与祖宗牌位,厅中悬挂着一块清同治年间的横匾,上有“益秀花开”四个烫金大字,字迹里透着金黄色的亮光。

走下厅就出了大门,大门两边有两尊威严的石狮,下了台阶是一个大禾坪,禾坪前是个半月形水塘,围着半月形村子绕着,远处就是大片的田野。村里有几十栋老屋,老屋与老屋之间有着两米左右宽的石板巷,穿过巷子又是另一巷子。村后边是一片片枫树,不远处有一条江,江上有座石拱桥。这树、这桥、这江,是儿时最深的记忆,无数次赶着鸭、牵着牛和羊来去,上学放学,也都要从桥上走过。夏天几乎整日泡在江里,最刺激的莫过于与伙伴们喊着“一、二、三”往下跳,一头扎进水里很长时间再冒上来。

世道变得飞快。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屋变得异常安静,再也看不到初一、十五的香火,看不到迎亲嫁娶、红白喜事时的烛光和跪拜、磕首场面,听不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世代留下的青砖黛瓦、马头翘角、天井堂屋渐渐地在现代建筑之中,没有了烟火。每每回老家走走,虽然见到的只是断壁残瓦,但童年里的老屋记忆仍然还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二

用镜头记录湖南古村落是近15年的事。第一张拍摄湖南古村落的照片是2006年3月。2011年退休后的10年间,我跑了全省80多个县(区、市),800多个古村落,数不清的老宅大院,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将所到之处的湖南古村的地理环境、村落格局、建筑特质以及历史渊源、文化传承、风貌风貌、生活场景等等,一一收在镜头里。

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拍摄湖南的古村,一是源于老屋情结;二是源于对老屋价值的认知;三是源于一个摄影人的社会责任。

老屋有诗意般的栖居美感,是其一。走过潇湘大地许多的村村寨寨,远远望去,哪里有山有水有桥有古树,定会有古村或老屋。走近一看,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立马展现在面前,并且很自然地想起马致远《天净沙》里的诗句来。湖南的古村是很讲究风水的,风水即地相,是地脉、山水自然美景。

这种美除了依山傍水的独特自然环境之外,民居的整体布局、外部造型,包括设计装饰,甚至排水系统也很有讲究。马头翘角、雕梁画栋,不仅仅渗透着厚重的民俗风情文化,而且一种美的韵律在其间。

老屋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其二。世界上最深刻的岁月,一是雕刻在脸上,一是雕刻在建筑里。在乡村能够留存至今的那些古老民居,大多也只有一个、二百年,即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即便如此,这些建筑都渗透着厚重的古风。老宅里的石刻、木雕,彩绘、檐画、楹联,以及家谱、匾额、神龛等等,都是历史文化遗存、传承与延续。

老屋有远去的歌谣,是其三。每每踏着青石板,走进那些古村老巷,就仿佛听到老屋里传来幽深的歌声。对我们从乡村出来的人来讲,人生最初的歌声多数是从老屋摇窝里听到的,不知传了多少代人的摇篮曲。夜晚,桐油灯下,母亲、奶奶手里做着针线活,一只脚踏在摇窝边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摇晃着,嘴里断断续续地哼着民谣。摇窝下面有两个可以来回滚动的竹筒,那声音,那节奏无疑是最好听、最美最动听的。

老屋有传说的动听故事,是其四。一栋老屋,一段历史,一串说不完的故事。多少寒门学子,怀揣着梦想,寒窗苦读,终于有一天,他们踏着乡间弯曲小路去赶考,于是有了“金榜题名”。多少人迎亲嫁娶,在老屋里,拜天地,拜高堂,叩首互拜,掀起那红盖头,于是有了“洞房花烛”。多少功成名就人土叶落归根,于是有了“衣锦还乡”。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生几件大幸事,与这些老屋有关。老屋孕育了生命,演绎着生命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老屋正在凋落与消失,是其五。在感受马致远《天净沙》里的美妙诗句和那些动听的歌谣时,面对一个个消失和正在消失的老屋场景,自然多了一份无奈与忧伤。不少老宅荒芜坍塌、冷落凋零,还有的仍在拆除。有的村落大院虽然挂着历史文化名村或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牌子,但并没有得到合理保护,不该拆的继续在拆,不该建的还在建。

我去过徽州,见过徽派建筑;去过山西,见过晋商大院。然而走遍湖南的古村老宅之后,感觉湘湖地区的古民居建筑完全可以与它们媲美,只是我们少了太多的保护,以至于不像徽派建筑、山西大院那么名播四海。

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说过,中国除了皇家建筑与士大夫建筑外,还有一种是风土建筑,中国南方的大多建筑都是风土建筑的范畴。

湖南湘水、资水流域地区的民居民宅,无一例外地属于风土建筑或乡土建筑,既借鉴了江浙、徽派外来建筑的一些元素,又传承了湖湘本土的历史文化。

数百万年前,当地地球板块运动撞击形成南岭山脉时,两条涓涓细流从湖南的蓝山和湘桂交界的高山上悄然流出,在永州的萍岛汇合成湘江,顺势北去,连溪流、纳百川、入洞庭……这条湖南的母亲河,全长969公里,覆盖湖南总地域面积45%,流经9个市,孕育了极具个性特色的湘东古村落。

其特色,一是规模恢宏大气。湘东地区的古村老宅多是大格局、大体量、大聚落。这些村落一般都是几百上千人,多的达四、五千人,甚至上万人。宁远县下灌村现在有12000人,明代的徐霞客当年曾描写它是“巨落”。这些老屋

一般是二进、三进纵深,有的是一门四进、五进。双牌县盘家大屋一门七进,即纵向六个天井,感觉湘湖地区的古民居建筑完全可以与它们媲美,只是我们少了太多的保护,以至于不像徽派建筑、山西大院那么名播四海。

桂阳县庙下村,保存明清以来的古建筑达230余栋;有着“江南第一屋场”之称的岳阳县张谷英村,至今保存房屋达1732间,206个天井,62条巷道;有着“湘南第一大院”之称的零陵岩头村周家大院,6栋独立大宅呈北斗七星形状布局,坐落在三面青山的环抱之中,从空中鸟瞰,甚为壮观。

二是历史源远流长。湘水流域的古村,每一个都有一部源远流长的繁衍史:道县龙村为永州最为古老的村落,两千年前先祖就在此繁衍生息,并且居住的是两位王侯的后裔,宗祠大门镌刻楹联“道德文章双进士,宜山圣水两侯王”。

三是族群文化厚重。湘东古村多以血缘关系为脉络,以姓氏为纽带繁衍的。湘东古村落的祠堂很多,他们以祠堂为中心向左右及其纵深发展。汝城县村村有祠堂,姓氏有祠堂,祠堂又分总祠与支祠,全县36万多人,280多个姓氏,保留着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00余座,祠堂几乎遍布了汝城县的每个村落,有的村甚至有六、七座之多,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

四



花垣县担岱苗寨的民俗活动。

谭建华 摄

湘东古村是一部厚重的书,湘西古寨则是一幅多彩的画。

大湘西地区的人,无论是苗、侗、土家、汉族,都习惯把村落叫作寨子,把自己的村庄说成“我屋的寨子”。寨子,自然是湘西人的居所,赖以生存的载体,也是湘西人的根基所在,是这片土地浓郁风情与厚重文化的孕育地。

湖南西部的28个县,有15个县与鄂、渝、黔、桂四省(市、自治区)交界,境内多山多水,土地贫瘠,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历朝皆属统治薄弱区域。

从远古时的苗族祖先蚩尤、土家族祖先八部大王和侗族先祖百越一支开始,千百年来,他们在湘西的寨子里刀

耕火种,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民居、民风、民情、民俗,进而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湘西古寨的这种文化底蕴,不仅极其深厚,而且为自己所特有。

湘西寨子,既是镶嵌在山水间的诗化风景线,也是民族文化产生的发祥地。从2008年至今,湘西成为我眷顾最多的地方。

寨子里的建筑或傍山而建,或倚水而立,与大自然紧密相融,这种特有的建筑既吸收了江浙、安徽和湘中湘东湘南地区建筑的元素,又传承了湘西楚巫文化的历史遗风,形成了北部以土家族分布为主、中部以苗族分布为



新田县大风头村壁画。谭建华 摄

湘东古村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许多著名人物,这些人物可谓“武能定国”“文能兴邦”,以至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与命运。无疑的,湘东古村既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地,也是催生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的地方,可谓“湘魂的摇篮”。

主、南部以侗族分布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苗族、土家族、侗族居住的“干栏式”吊脚楼,凤凰腊尔山地区为中心一带苗人居住的“土屋”和怀化地区集经商与居住为一体的“窗子屋”,都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和传统民居烙印,形成了湘西本土文化所特有的建筑符号。

在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中,尤以沅水流域最赋有诗意,历史文化最为深厚。屈原生于秭归,死在汨罗,流放地在溆浦,在沅水生活了十几年。沅水成就了屈原的《楚辞》;成就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成就了文天祥沈从文的《边城》。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与场景都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土地。

沅水还有溆、辰、武、西、渠、巫、瀘七大支流,各支流又有数不清的小溪与河谷,凤凰沱江,龙山洗车河、永顺猛洞河、通道坪坦河,且有着许许多多古老的传说。自古以来,祖先们依山傍水,沿水而居,世代繁衍,在沅水旁渐渐形成了颇具湖湘地域特色和大湘西风土气息的栖居之所。土山寨、吊脚楼、窗子屋……洒落在山水之间。

许多时候,我打开电脑,细细翻翻这些年所拍摄的照片,村村寨寨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黄土墙、木板房、窗子屋,逶迤的石板路、高耸的封火墙、小碧玉般的吊脚楼,还有牛粪竹篱笆墙,既亲近又陌生,似在眼前却又遥远,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每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物,甚至他们的脸部表情都历历在目,自然而然会想起行走于村寨里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场景。

湘江观潮



《我的家乡十八洞》书影。

汤素兰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预设对象的文学,因其读者的特殊性,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是其美学的代名词。我们所熟知的儿童文学,大多是以母爱、童真、自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更适宜表达一些恒定与普世的主题,彰显真善美的价值。

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无处不在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故事,也有许多作家以高度的时代敏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描绘出了新时代的恢弘气象,写出了跟得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儿童文学可否表现大时代的大主题呢?又如何表现大时代的大主题?这是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我尝试以童话的方式,表达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我创作于2019年的长篇童话《奔向绿心》,就是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许多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的土地抛荒,乡村空心化。乡村的出路在哪里?荒芜的田园如何恢复生机?于是,我让一头神奇的黄牛带着城里长大的孩子田田回到农村,我也让云岭上的一丘梯田飞翔起来,来到田田读书的学校。

在这个故事里,我让孩子们认识了禾苗,听到了蛙声,我还把农事、民俗融入故事,通过神奇的童话故事,带领小读者走进我们的农业文化遗产——梯田,走进朴素的农家,去亲近大地和劳动,关心粮食和蔬菜。因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是国家的战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孩子的责任。

我试图打通现实题材和童话幻想的路径,将童话的幻想、诗意,将儿童文学特有的儿童情趣、儿童想象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契合起来,探索表达的可能。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故事获得了成功,出版以后,不仅得到了专家的肯定,也得到了小读者的喜爱。

十八洞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也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具体体现。为少年儿童讲述十八洞的故事,既是为时代抒怀,也是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尽的责任。

关于十八洞的变迁历史,已经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歌曲、报告文学等等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过了,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要如何向孩子们讲述十八洞的故事呢?

我决定到十八洞去采风,增加实地体验和感受。当我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来到梨子寨的最高处,站在已经有260多年树龄的梨子树下时,我仰望大树,看到梨树上的鸟窝,一个念头浮现出来:这棵梨树是梨子寨的见证者,我可否从一棵树的角度,讲一座村庄的变迁呢?这时,恰巧从不远处的银杏树上传来喜鹊喳喳的叫声,于是,故事的主人公出现了——幸福树和报喜鸟。

鸟儿从远方衔来一颗梨核,梨核长成梨树,梨树想给村里人甜甜的果子,想做一棵幸福树,但它目睹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离别。喜鹊一直想报喜,但村里的喜事太少了,喜鹊飞走了。直到有一天,喜鹊带来喜讯……故事自然地在我的思绪中流淌出来,我以一棵梨树的自述,写出了儿童图画书《我的家乡十八洞》。这是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十八洞故事,而且是以图画书的方式讲述的。

如何在儿童文学中展现时代以及主题性内容,让我想起了卡尔维诺所说的文学艺术的“轻”与“重”的关系。

作家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环境中的人,在写作中无可避免地会面临表现时代与推动时代发展的重大事件的问题,但作家又必须跨越这些原材料的沉重之感而采用轻盈之笔,即艺术地表达。

卡尔维诺举了古希腊神话中英雄珀尔修斯战胜蛇发女妖美杜莎的例子来说明。不管是谁,一旦接触到美杜莎的目光就会变成石头。聪明的珀尔修斯借助于盾牌反映出来的影像来看她,最终取下了美杜莎的头颅。卡尔维诺认为这则古希腊神话恰好说明了作家与现实题材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聪明的珀尔修斯借助盾牌观察美杜莎,作家在表现现实世界的时候,必须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也就是减轻现实材料的沉重之感,而达到艺术上的轻盈之美。但他同时又强调,必须轻得像鸟儿,而不是羽毛,即你的艺术创造必须有生活基础和生命体验,而不是纯粹的空想。

在《我的家乡十八洞》的写作中,我以童话拟人的手法和散文诗式的语言,讲述十八洞的变迁,这种方式避免了直接生硬的主题表达,也和孩子们思维更接近。而且我不只是想讲述十八洞村的故事,我更想让十八洞村超越其具体与唯一,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新山乡巨变的缩影。

伟大的时代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馈赠给作家众多的写作素材,也向作家们提出了新的命题。这是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福气,也是我所面临的考验。我们只有更加潜心创作,磨练艺术技巧,更加用心用情,才能为少年儿童讲好时代故事,引领他们更深刻地了解时代和历史,感受家国家园之美。

(作者为省作协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奔向更广阔的童话世界